



张 辉 宋炳辉 主编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

刘洪涛 著

从国别文学走向世界文学

From National Literatures to World Literature

 复旦大学出版社

刘洪涛 著

从国别文学走向世界文学

From National Literatures to World Literatur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国别文学走向世界文学/刘洪涛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张辉, 宋炳辉主编)
ISBN 978-7-309-10648-0

I. 从… II. 刘… III. 世界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5136 号



从国别文学走向世界文学

刘洪涛 著

责任编辑/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 字数 252 千

201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648-0/1 · 835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学术顾问：乐黛云 杨慧林 谢天振

陈思和 陈跃红

主 编：张 辉 宋炳辉

代序：如何成为世界文学？

—

歌德在 1827—1830 年间发表的世界文学系列言论，有两个立足点是值得我们格外重视的：他说“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开始，每个人都必须为加速这一时代而努力。”这是把世界文学看成一个合乎世界主义的理想，期许它能够助推各民族文学逐渐打破孤立割裂状态，影响融合而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他又说：“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我们德国人在其中可以扮演光荣的角色。”这表明歌德同时将世界文学当成彰显民族文学价值的场所。由此可见，世界文学观念在创制之初，就蕴涵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种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既展示了世界胸怀，又表达了本土立场。而事实上，世界文学观念正是因为有这两种矛盾统一的价值观所形成的内在张力，才充满活力和魅力，成为近两百年来一直热议不断的重要学术话题。

我对世界文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兴趣，产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最初的契机是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合并（1997），这触发了我对两个专业的关系，以及世界文学（外国文学）性质和学科史的思考，先后发表了《中学语文中的外国文学问题》（2001）、《文学关系还是世界文学？》（2003）、《世界文学：学科整合与历史承担》（2003）、《中国的世界文学史写作与世界文学观》（2004）等论文。2008 年之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实务与研究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主编了《新世纪国外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文情报告（北美卷）》以及“21 世纪北美中国文学研究著译丛书”，还与几位国内外同事共同创办了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今日中国文学》)杂志。因为我对世界文学理论与实践的兴趣始终没有中断,同时试图将世界文学话语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联系起来,为后者提供理论支撑,因此先后写了《世界文学的诸种可能》(访谈录,2008)、《美国〈当代世界文学〉杂志与中国文学》(2009)、《世界文学观念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两次实践》(2010)、《美国中学世界文学教科书中的中国文学》(与人合作,2011)、《世界文学观念的嬗变及其在中国的意义》(2012)、《〈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理论与实践》(2014)等论文,合作主编了《世界文学理论读本》(2013)。如果说自己这十多年研究世界文学理论与实践的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话语层面与学科层面并重,总结中国经验与介绍国外成果并举。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加强了对世界文学话语建构的研究。在2008年的时候,纽曼华语文学奖(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把首届奖项颁给了莫言。2009年3月,我作为该纽曼奖的评委,陪同莫言前往美国领奖。我在颁奖仪式上,作了题为《莫言小说与中国乡土文学传统》^①的发言。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认为莫言融合了鲁迅和沈从文开创的中国乡土文学的两个传统,即乡土批判和乡土抒情,而这两个传统共同书写了后发国家追赶现代化语境中的民族想象与国家寓言。参加那次颁奖典礼的,还有纽曼华语文学奖评委、莫言小说的主要英译者葛浩文,以及斯坦福大学的李海燕教授、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黄承元教授,活动的组织方是俄克拉荷马大学美中关系研究所和*World Literature Today*(《当代世界文学》)杂志社。这让我有机会了解到莫言在英语世界中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意义。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参加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组织的两次学术研讨会,会上我都提到,在中国文坛有一批与莫言成就相当的作家,像贾平

^① Liu Hongtao, "Mo Yan's Fiction and the Chinese Nativist Literary Tradition," *World Literature Today*, July/August 2009.

凹、余华、阎连科、苏童等,但他们谁都没有莫言在国外有更多、更好的译本出版,有更多的学者进行研究,有更多的媒体介绍。所以说,汉语空间中的莫言与异语言空间中的莫言是不能等同的。莫言能够获奖,除了他本人原创作品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还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异语言异文化空间,也就是世界文学空间的影响力。

二

事实上,无论是学科层面的世界文学,还是话语层面的世界文学,在学术界一直有质疑之声。在学科层面,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世界文学研究难以在学理上成立,理由是真正的文学研究是建立在掌握了对象语言的基础之上的。世界文学既然包括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学,研究者又不可能通晓所有民族的语言,因而也就不可能研究作为整体的世界文学;借助译本和经过翻译的二手信息只是一种了解原语国文学的权宜之计,真正的学术研究是不可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建立在掌握了对象语言基础之上的研究当然更具权威性和可信度,也没有人会反对这种“理想”的研究。但现实问题是,能够做到熟练应用两种以上外语研究用这些语言书写的文学作品的学者凤毛麟角;即便有一大批掌握三种以上语言的学者出现,比起世界上实际存在的上百种语言文学,仍然是杯水车薪。可见依靠掌握语言之“多”、阅读之广,并不是解决研究世界文学问题的根本办法。由于认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以及现实的巨大需求,许多学者更积极地评价翻译对世界文学的贡献,以及通过译本研究世界文学。早在1911年,美国学者理查德·莫尔顿(Richard Moulton)在其《世界文学及其在总体文化中的位置》一书中,就为译本的价值做过有力的辩护。莫尔顿认为,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来自原语言崇拜的偏见。他认为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显而易见,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不依赖译本是不可能进行的。现在,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即阅读翻译文学是一种权宜之计,有二手学问的味道。但这一想法本身是对文学进行分科研究的产物,

这种分科研究迄今仍然流行,它不能摆脱语言和文学的紧密纠缠,以致很难想象将二者分隔开来。这种想法经不住理性的检验。如果一个人,不通过希腊文,而是通过英文读荷马,他毫无疑问会失掉一些东西。但问题出来了,他失去了什么?他失去了文学吗?很清楚,相当大比例构成文学的东西没有丧失;古老生活的描写,史诗叙事的节奏,英雄形象的观念和事件,情节技巧,美妙的比喻——荷马史诗中的所有这些元素对与译本的读者仍然敞开着。”^①莫尔顿的观点,在郑振铎1922年所写的《文学的统一观》^②中得到了积极响应。而郑振铎正是在这一思想鼓舞下,以一人之力撰写了《文学大纲》(1927)。这是汉语学术界第一部世界文学通史类著作,填补了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的空白。以今天的眼光看,这部巨著仍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至今,不少西方学者吸收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成果,在世界文学阅读和研究方法方面,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如艾田伯、达姆罗什、莫莱蒂等人。尤其是莫莱蒂提出的“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法,很有启发性,值得借鉴。

在话语层面,世界文学所受到的质疑同样存在。按照卡萨诺瓦在《世界文学共和国》(1999)一书中的观点,世界文学是一个超越国界的全球一体化关系结构。像现实中的国家一样,它有首都,有外省;有中心,有边缘;有宗主国,有殖民地。世界文学体系的主要特征是等级制和不平等,文学资本往往高度集中在首都或宗主国这样的中心地带,对世界文学格局起支配作用,而边缘地区的文学则是从属和依附性的。在卡萨诺瓦的描绘中,法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核心,欧洲文学也居于中心区域,而亚洲、非洲则处在世界文学共和国的边缘地区,在文学权力和市场份额的争夺中处在劣势地位。卡萨诺瓦将

① Richard Moulton, *World Literature and Its Place in General Culture*, Norwood, Mass.: Norwood Press, 1911, p. 3.

② 原文载《小说月报》1922年8月第13卷第8期,校订后的文本收入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该文的主要观点,受到莫尔顿《世界文学及其在总体文化中的位置》一书的影响。

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各区域文学的不平等性,傲慢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是世界文学话语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又一次集中暴露。

正因为世界文学话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浸染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一些海外汉学家对其能否在拓展中国文学海外市场、提升中国文学海外影响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心存疑虑。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an Owen)在1990年11月19日《新共和》上发表《全球影响的焦虑:什么是世界诗歌》一文,引发国际汉学界的热烈讨论。安德鲁·琼斯在1994年发表《“世界”文学经济中的中国文学》一文,呼应宇文所安的观点。2004年,宇文所安意犹未尽,又写了《前进与后退:“世界”诗歌的问题和可能》一文,补充、扩展自己的观点。宇文所安文章借讨论北岛诗歌的可译性,反思世界文学话语中的西方霸权及其危害。他把北岛诗歌称为“世界诗歌”,是指北岛为了易于被全球(主要是英美)读者理解,有意在创作时弃用有明显中国特色的韵律和词汇,而采用最容易翻译为外国语言的诗歌媒介——意象进行创作的诗歌。在宇文所安看来,这样的世界诗歌剪断了扎在特定国别和语言中的根基,从而成为西方现代主义的另一版本,是西方文化霸权借世界文学话语扩张的明证。安德鲁·琼斯的文章以中国当代文学在美国的翻译和接受为例,对世界文学话语中包含的西方文化霸权进行了反思。他直言歌德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充满了东方主义修辞,是以帝国主义方式构造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当前中国文学在跨国文学经济中,并没有向上活动,而是处在全球村边缘的某个文化聚居区,这个聚居区四周的高墙正是世界文学话语堆砌的。而要减少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阻力,应该推倒世界文学话语高墙。宇文所安和安德鲁·琼斯这两位西方汉学家,都对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空间持反对态度,都认为中国文学有自己的空间,不必去讨好他人。

三

与海外汉学界质疑世界文学话语相反,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始终有着“走向世界文学”的强烈冲动,对进入世界文学空间持积极态度。其突出体现,是在1985年,一部由曾小逸主编的文学研究著作

《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由湖南文学出版社出版。从 25 年后的今天来看,该书最重要的贡献,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热潮中,将“走向世界”这一时代流行语加以创造性利用,提出了“走向世界文学”的命题。曾小逸在为此书撰写的长篇导言《论世界文学时代》中,依据文学的交流方式与总体结构的演变,将全球文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1)各地方、各集团的文学在交流中融合为民族文学时代,特征是内部交流与分途发展;(2)各民族的近现代文学在交流与融合中诞生世界文学总体的时代——近现代文学时代,特征是东西方文学的交流与融会;(3)世界文学总体内的各民族文学在交流与融合中向一体化的世界文学发展的时代——总体文学时代,特征是交流意味着一切;(4)人类未来的一体化世界文学时代。

这个“走向世界文学”的表述,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内学术界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一书的实际内容,是研究中国现代作家所受的外来影响,尤其是西方文学的影响,如鲁迅受到什么影响,茅盾受到什么影响,巴金受到什么影响,徐志摩受到什么影响等。这样的内容与曾小逸在导言中的表述构成了一种对应关系:所谓走向世界文学,就是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用外来的先进文学革新落后的中国文学。1949 年之后,中国文学先是经历了 17 年单方面向苏联文学学习,随后是 10 年“文革”时期的闭关锁国,已经饱受封闭之害。在 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文学急迫地需要打破自身的孤立隔绝状态,汇入世界文学大潮,而学习、借鉴、挪用西方文学的先进经验,被描述成中国文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学者们谈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功经验,关照的是当下中国文学甚至中国社会如何发展的现实问题。

曾小逸将“走向世界文学”等同于接受西方文学影响,把接受这种影响看成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论述有其具体的历史语境与合理性,但这一论述无疑进一步证实了卡萨诺瓦对于世界文学是由中心—边缘构成的不平等体系的判断。进入 21 世纪,这种依

靠单方面输入来建立与世界文学联结的模式开始受到质疑。21 世纪伊始,陈思和等学者在《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发起了“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讨论,持续了 2 年时间。这场讨论的初衷,是试图解决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出现的方法失效问题。陈思和指出:“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进入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格局时,原有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代之以八面来风的外来文化思潮冲击。在这样一种‘泛影响’的场境中,原先在研究封闭形态的文化交流关系中应付裕如的影响研究方法,却反倒无从施展了。”他因此认为这种研究方法“需要解构和颠覆”^①。

作为“解构和颠覆”的一种策略和思路,陈思和等人提出要“确立中国文学在文学交流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它具体表现为“中国文化自身的社会运动(其中也包含了世界的影响)中,形成某些特有的审美意识,它们或许与世界文化的发展取得同步的姿态,并以自身的独特面貌,加入世界文学的行列,并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内容。因此,既有的‘世界—中国’(及影响者—接受者)的二元对立结构不再重要,因为,中国是在与其他国家的文学在对等的地位上,共同构建‘世界’文学”。陈思和把这种共同性命名为“世界性因素”。他强调这种“将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发生作为线索”的角度,在认识“百年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方面,将获得一种“全新的认识”,这种观念还能“刷新我们潜意识中由西方制造的现代化概念”^②。

现在看来,这场讨论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范畴。它是在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民族越来越自信的背景下产生的。20 世纪 80 年代“走向世界文学”的概念,是将中国文学当成自外于世界文学的“孤儿”,其地位和性质是从属性的,依附性的。而讨论“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强调的是中国文学的主体性,是把中国文学看成世界文学的参与者,世界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其诸多世

①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编者的话》,《中国比较文学》2000 年第 1 期。

② 同上。

界性因素,具有本土生成性和原创性。由此,中国文学被放到与其他国家文学平等的地位上,成为世界文学的共同构建者。

从曾小逸提出的“走向世界文学”到陈思和提出的“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我拿”到“我有”的发展,这期间,世界文学话语的转换经历了 15 年。再 10 年之后的 2012 年,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到海内外 150 多位作家、学者共襄盛举。这样的命题在 20 年前,甚至 10 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传播”意味着你已经拥有了强大到足以影响别人的实力。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文学的实力正在迅速提升,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最新证明。但如何更好地应用这一实力,使其在国际上发挥更大效用,我认为话语权是非常重要的。世界文学话语是一个公共容器,并非西方所独有,完全可以为我所用。在经历了从“我拿”到“我有”的发展之后,现在到了“我给”的阶段了。但如何给? 中国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 就成为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重要学术课题。

四

自歌德创制世界文学观念以来,“成为世界文学”一直被看成民族文学获得提升的通道,意味着至高的荣誉。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上形形色色的奖励机制,如评奖、排行榜、文学节庆、会议、书展等活动,尤其是诺贝尔文学奖,把民族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空间,变成了一种竞争活动。这种现象被国际学术界称为“肯认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因为评价体制永远受少数人控制,而获奖者少之又少,加之有高额物质奖励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荣誉,这一荣誉反过来又会刺激图书的出版和销售,给作家带来更大的利益,因此,争取肯认的竞争往往异常激烈。这就会给很多作家一种导向,让他们去费心猜测:这些奖项授予了什么类型的作品? 然后去投其所好。又因为有重要国际影响的评价体系都在西方,而最想进入世界文学空间的往往是非西方作家,因此,投西方所好就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给指责者以口实,给作家以巨大压力。1987 年张艺谋执导的《红

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之后就受到过这种批评。这也是宇文所安、安德鲁·琼斯主张的推倒世界文学话语所堆砌的城墙,抛弃这套游戏规则的原因。但如何能真正打破这种魔咒,我认为宇文所安和安德鲁·琼斯提供的并不是有效的办法。民族文学需要在世界文学空间中展示自己,这就像优秀的体育运动员都渴望参加奥运会一样。在全球化时代,已经不可能再关上国门,自产自销、自吹自擂、夜郎自大。参与国际竞争是必然的,无从回避,也不能回避,国家如此,文学同样如此。

那么,如何成为世界文学?

翻译是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首要选项。达莫若什的定义“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以及“世界文学是因翻译而增色加分的作品”,我在本书所收《〈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理论与实践》中做过详细解释。这个定义之所以重要,在于提出了一个世界文学的公共空间。民族文学不是天然就能成为世界文学,而必须像光线发生折射那样,穿过语言、文化、时间、空间等构成的介质,在椭圆形空间中反射出的第二个焦点,由此形成一种混杂、共生的作品。“椭圆形折射”理论预设了文本经过翻译被扭曲和变形的必然,但这是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必须付出的代价,最终会使原本文本获益。

德国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本雅明在其《翻译者的任务》(1923)一文中,讨论了作品的可译性,以及原作与译作之关系诸问题。前述莫尔顿为译本辩护的出发点,是认为译本能够忠实地复现原作的面貌,本雅明的辩护正好相反。他认为译本的价值不在于从字面和句法上忠实地复制原作,而在于忠实原作的意向,在于挖掘和传递原作的本质属性。由于译作晚于原作,同时也因为重要的世界文学作品从来不可能在其诞生之日就觅见所有选定的译者,因此它们的翻译往往标志着其延续了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译作是原作生命的延续与发展,“翻译也将迈过原作而前行”,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20世纪70年代以降,随着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伊塔马·

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翻译理论,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改写理论,巴巴拉·戈达尔德(Barbara Godard)、雪莉·西蒙(Sherry Simon)等人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大行其道,本雅明的翻译观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引述,甚至被抬上神主的牌位。而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之后兴起的各种翻译理论,与本雅明的翻译观一脉相承,都是从不同角度和领域,对译本之于原本的独立性及其价值进行研究。而这些研究,都给世界文学理论以启发和鼓舞。达姆罗什的定义可说是受翻译理论启发而产生的当代世界文学理论最重要的成果。而莫言获奖,再一次证明了达姆罗什的论断。莫言小说的葛浩文英译本存在大量改写和变异的现象,已经被研究者所证实。如果我们取原作本质主义的态度,它们就是次级的衍生品,但如果从世界文学角度看,这些译本体现的不只是原文本信息的遗失和变形,更显示出两种文化的碰撞和对话,以及文本在另一种语言中的移植与重生,因而对中国文学是有益的。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通过翻译进入世界文学空间,它所发挥的作用是受限的。翻译受译者、市场等因素的制约,而最终取决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关系。中国是外国文学翻译大国,每年有海量的外国作品翻译到中国。比较之下,又有多少中国作品翻译到国外?又有多少优秀的译作产生?我对此并不乐观。如果我们都挤在翻译这座独木桥上,相信了达姆罗什的话,认为成为世界文学只有这华山一条路,那就是目光狭隘的表现。

成为世界文学不止翻译一条路,至少还有另外四条途径,是以前中国学界所忽略的。其一是区域世界文学。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副教授唐丽园写于2010年的论文《反思世界文学中的世界:中国大陆、台湾、东亚及文学接触星云》^①是一篇研究东亚区域世界文学的佳作。按照西方的世界文学话语,世界文学的形成从欧洲开始,然后逐渐地

^① 译文载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扩展到其他区域。因为占据了所谓“源头”的优势,西方文学于是被安稳地放置在世界文学的中心区域,而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地区的文学,则被置于边缘区域。唐丽园认为,这样的世界文学话语应该被打破,新的世界文学研究必须采纳对文学、文化和民族更多元的理解。唐丽园这篇文章考察了东亚地区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现当代文学中普遍存在的互文、改写、挪用、交流等现象,指出其创造出了一个相互平等、彼此混合、边缘模糊的文学接触“星云”(nebulae/nebulas),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共同体。唐丽园期许如此分析非西方文学作品在区域内的交互作用,有助于整合与重塑“地方的”和“全球的”概念,为世界文学找到一条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并接近区域中立的途径。

其二是汉语世界文学。“汉语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和应用,是彰显世界文学的“中国性”,用中国文学影响世界文学的有效策略。所谓“汉语世界文学”,套用的是“英语世界文学”、“法语世界文学”、“西班牙语世界文学”等概念,指的是一种语言文学跨国界、跨地区流通的现象,即包含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也包含世界文学的中国化。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拥有强大的基础,除了中国大陆,还有中国台湾、香港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他们以中文及其文化为根,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史书美(Shu-mei Shih)在《视觉与身份:跨太平洋的华语表述》(*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中,提出了“华语语系”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中国之外和处在中国或中国性边缘的文化生产场域的网状系统”,那么这个网状系统中生产的文学就是“汉语世界文学”。2013年11月我去新加坡新跃大学参加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参加答辩的还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原国文系主任陈荣照教授,当时他主编的七大卷《亚细安现代华文文学作品选》刚刚出版,是东盟国家汉语世界文学的一个新见证。此外,北美、欧洲地区的汉语世界文学更为活跃,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家作品。不可否认,汉语世界文学还远没有达到像英语世界文学、法语世界文学那样的世界化程度,但这的确是

可以期待的。

其三是华裔世界文学。这是以血统作为联系纽带的世界文学，有犹太裔世界文学、非裔世界文学，当然应该有华裔世界文学。所谓华裔世界文学的概念，是指来自中国或有中国血统的作家，用其所在国家语言进行创作的一个群体，如华裔英语文学、华裔法语文学等。目前，北美华裔文学的影响尤其大，谭恩美、汤婷婷、赵建秀、裘小龙、哈金等，都有重要的影响。对于这些作家所在国来说，他们是本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但从族裔角度看，他们又是世界化了的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如同双重国籍一样。历史上，林语堂、张爱玲的英语作品，也是被当成美国文学的一部分的。在当今族裔多元、血统混杂越来越普遍、跨国迁移越来越频繁的时代，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将这些作品拒之门外。

其四是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世界文学。它是指在异文化空间中，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碎片式存在。前四种形态的世界文学都体现为具体的文本，是一部部完整的作品，而这第四种中国贡献的世界文学并不以独立、完整的文本形态出现，而寄生在受中国文学与文化影响的域外作品之中，构成了这些文本的重要元素；这些作品也就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中国文学文化对世界各国文学的影响是广泛存在的，在东亚各国如此，欧洲、美洲也是如此。诗人庞德通过翻译创作的诗歌《神州集》、《刘彻》，以及化用了许多中国文化文学元素的《诗章》，都属于这一类作品。现在美国有一批学者研究的“跨太平洋诗学”（Trans-Pacific Poetics），着力点就是美国文学中的东亚文化元素。费诺罗萨、庞德、斯蒂文斯、摩尔、斯奈德、叶维廉、车学敬、凯鲁亚克、金斯堡、肯尼斯·雷克斯罗思、约翰·凯奇、加里·斯奈德、罗伯特·布莱、默尔文、罗伯特·哈斯等众多美国诗人和作家的创作中表现了这些元素，从而构成了“跨太平洋诗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跨太平洋诗学”不同于传统影响研究，它摆脱了仅重视文本影响和文化还原的狭隘思路，从民族志、翻译、互文旅行等多角度切入，对这类美国诗人和作家作品中蕴涵的地域之间对话、想象、相交、混杂、统一特性进行

深入系统的研究,目的是呈现西亚太平地区,尤其是中国的文化如何注入以欧洲文化为根基的美国文学,帮助其形成自身特性。这一类世界文学中,中国文化融入异文化最深,影响最持久,也最重要,它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追求的最终结果,理应受到重视。

总之,世界文学是一个复数,有多样形态的世界文学,任何一种世界文学都是重要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持续强健中国文学的母体,使之从多种途径不断扩大国际影响,让世界文学具有更多的中国性。

收入本书的文稿大多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个别篇目选自本人已出版的著作,涉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基本领域,也表达了著者对该学科总体发展趋势的个人看法。感谢丛书主编张辉教授和宋炳辉教授的约稿,使我出版这部著作的心愿得以实现。感谢乐黛云教授、陈惇教授、李明滨教授、钱理群教授、刘象愚教授、张健教授、聂珍钊教授、曹顺庆教授、陈跃红教授、刘勇教授、王立新教授、查明建教授这些年对我的提携、帮助和支持。感谢刊发过书中论文的《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比较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南开学报》等学术期刊。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余璐瑶女士为本书的编辑付出了辛劳,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姜天翔同学也为此书的编辑出力甚多,也谢谢你们。

2014年3月于北京师范大学丽泽园